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二

图书馆业务 自学大全

(1) 图书馆学引论

梁德林 孟广均 辛希孟 编 著
况能富 杨沛超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学引论

梁德林 孟广均 辛希孟 编 著
况能富 杨沛超

1987年 5月 · 长春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总序

金恩晖

一、出版缘起

时光飞逝，岁月如流，七年仿佛一瞬间；又是五月了，许多珍贵的往事、亲切的回忆一幕一幕地在我脑海中闪现。

那是七年前五月里的一天——1980年5月5日，也恰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吉林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吉林省总工会宣传部联合举办，并委托吉林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承办的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正式开学了。

这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吉林省图书馆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一步，也是我国图书馆界在当时举办的第一所相当中专水平的函授学校。她的产生，有其必然的因素。首先是吉林省各系统、各类型、各级图书馆、情报、资料单位广大工作人员学习专业知识的迫切要求，其次是文化部、吉林省文物局（后并入省文化厅）以及吉林省教育、工会、科研等有关图书馆的主管部门领导同志的同心协作、全力支持。

当图书馆事业刚刚从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中起步时，我们队伍的状况是：老同志少、新同志多，青黄不接，后继乏

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函授专修科虽然开始恢复招生，但那是以培训图书馆在职的、具有大专水平的专业人员为目标的，每年在各省招生人数皆有限，各图书馆、特别是广大的基层图书馆中大量的初级人员的专业培训任务，则是更为迫切的。我当时在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工作，每到各市、县馆进行调查研究或业务辅导时，或者到部队、机关、学校（中专、中小学）、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图书室交流情况时，深感有对大多数基层图书馆、情报、资料单位的在职工作人员、特别是青年同志进行普及图书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理论的必要。其中还有相当一批已具有中专、乃至大专以上其他学科毕业学历而缺少图书馆专业知识的新同志，他们也极其迫切地需要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知识。

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历史，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的：一学校教育；二短期训练班，研究班；三业余教育。业余教育是一种经常地、普遍地培养、提高图书馆、情报单位在职干部的形式，其中以函授教育为主要形式。它的特点是不脱产，边工作边学习，既能保证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又培养了干部。我国函授教育一般规定只适用于大专以上水平的学员的培训，而对于中专水平的学员则认为，一般不宜搞函授。这从学员基础知识、自学能力、教材特点等方面考虑，当然是有道理的。

那么，图书馆、情报、资料专业进行中专函授是否可行呢？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即对此进行了实践。我们从1980年5月——1982年12月从全省范围内（包括内蒙的哲里木盟、兴安盟）招收了1224名学员，通过两年多的函授学习，毕业

了817名；第二届从1985年3月——1987年3月，招收750名学员，经过两年的函授学习，毕业了652名。这两届函授中专学校的举办共培养了基层图书馆、情报、资料工作人员1974名，毕业合格者共1469名。事实证明图书馆办中专函授是可行的，基本上是成功的。今天，图书馆中专函授生，已经成为遍布我省广大基层图书馆（室）的业务骨干，许多人成为图书馆（室）的负责人，许多人通过考核，被评聘为管理员、助理馆员乃至馆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许多人结合本职工作实践，写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还有的人以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所学技术知识为基础，考入了高等院校有关专业进行深造。这就都是充分地证明。至于许多其他专业的大专毕业生先从事图书馆工作，由于系统地学习了这套图书馆专业教材，迅速提高了科研、教学和业务水平而获得很多科研与实际工作成果的事例更屡见不鲜。

图书馆办中专函授为什么可行呢？这是由我们专业的学科特点、学员的实际状况及以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材内容所决定的。图书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员们目前所从事的实际工作一般就是中专函授教学的内容。从培训目标上，要求学员具备有基层的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在工作岗位上能够熟练地完成其所担任的工作；建立了一套比较符合实际的教育制度，如设立函授辅导站，加强对学员的面授辅导等；在教材建设上，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科学地采购、整理、管理和利用图书、文献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主要内容，同时注意从理论方面，从当今学科互相渗透、交叉方面，从图书馆现代化发展趋势方面，增加一些新内容；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始终体现以业余、自学为主这一函授教育的规律;教材的组织、体系的安排以及重点的选择、难点的阐述方面,尽量使之具备无师自通、便于自学的特点。

当然,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所要解决的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的提高问题,其教学内容和教材体系紧紧围绕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全面传授,对于图书馆从业人员所必备的政治、文化知识,外语(或古汉语)知识等,则鼓励学员在工作岗位上自学,未编成专门教材。这也是应当说明的。

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所编的这一套教材从1980年5月以油印本陆续刊行并用于教学以后,即收到国内许多省、市、自治区各级、各类图书馆来函索要。为满足需要,我们即从1981年初开始,以《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丛书的名义,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陆续出版。到目前为止,已印了三万套。据我所知,《大全》除了被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两届学员共近两千人使用外,国内许多基层图书馆的同志将她作为业余自学、岗位成才的用书,并先后被山西、辽宁、福建、安徽、宁夏等省、市、自治区所办学校或培训班或取其十余种书大部,或取某数种书,作为培训图书馆各类专业人员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自从《大全》陆续出版以后,1982年10月,广东、广西、河南、湖北、湖南五省(区)的六所省级公共图书馆编著的《图书馆专业进修教材》八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1月,四川省图书馆学会主编的《图书馆学知识丛书》十六种,由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出版。1982年,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主持全国图书馆

界人员业务职称考核时规定：“鉴于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套定型的中等图书馆专业用书”，“申请‘管理员’职称而不具备中专水平的图书资料专业干部复习、测验”时，“可主要参照中南五省图书馆合编的《中等图书馆专业教材》、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辑的《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和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编《图书馆中等专业教材》等书”。中南五省和四川省这两套“中专教材”即是上述广西版的八种、四川版的十六种书的别名。由于文化部图书馆局对这三套中专教材的肯定，使她们在我国图书馆界评定专业人员技术职称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二、编撰经过

我是1979年冬接受主编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全套教材任务的。当时，“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政方针，把一切工作，包括图书馆工作引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创办图书馆函授学校，为培训专业人才出一把力，自然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函授学校的两位负责人吉林省图书馆馆长许鼎同志和吉林省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张庆春同志找到了我，明确地对我说：

“这个函授学校能否立得住、办得好，关键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符合教学要求的教材。组织决定，组成十五人参加的教材编辑委员会，由你任主编，并总其成；各书执笔人分司其责。主编的职责是：确定整个教材结构、体例；拟出每种书的框架及各章节细目；修改和统一全书文字；掌握全部教材编写与出版进度。……如果省馆人力不足、水平有限，可以广泛地吸收省内外其他系统的图书馆专家来参与编

写，请同行们多多给予支持和指导。”

从道理上讲，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接受这个任务也算是搞本行。但我自196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无缘。先后做过俄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解放前旧平装书的整理，线装地方志的整理，旧书刊的采购，参考咨询和业务辅导等工作，但那都是“文革”前五年间的事，属于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图书馆具体工作的适应阶段。十年动乱，正常的业务几乎停辍了十年，原有的一点专业知识，尚未恢复，旷学日久，偶一回首，不寒而栗，怎堪担此重任？於是推托再三，固辞其职。但彼时函授学校之议已传布于省内图书馆界，基层的同志纷纷来函要求报名，并催促函授尽快开张。容不得再讨价还价，我只好背着水平低、能力差，浅学陋识，疏谬舛误自知难免的包袱仓促上马，硬着头皮，开动脑筋，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于1980年1月10日草拟出函授学校教材编写大纲和细目。

感谢图书馆界的师长、同窗学友和同行们，他们迅速地对整个教材体系、各书的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且表示愿意为这套通俗而平凡的丛书贡献力量。於是，从1980年5月开始，这套教材即先以油印本刊行以应付教学，继之以《大全》名义出版交流。先后参与这套丛书编撰工作的同志有：周文骏、张琪玉、杜克、黄万新、赵世良、史永元、张树华、曹殿举、符孝佐、孟广均、辛希孟、吴慰慈、孟昭晋、江乃武、赫彦生、赵厚源、沈迪飞、梁林德、张嘉澍、刘彭、况能富、邢淑贤、李怀智、韩玉光、陈久仁、孙闰凡、杨沛超、吴争、宋桂文、鄒秀玉、徐光复等。其中有十五位是我在北

京大学读书时耳提面命地授我以知识的师长或与我前后有同窗之谊的学友,有三位是北京大学函授毕业的同学,有十二位是在我们吉林省图书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如果从上述编著者所在单位来看,则其包容方面之广也是令人感动的,除了吉林省图书馆的同志们外,他们还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黑龙江省图书馆,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东北电力学院图书馆,东北电力学院图书情报专业,吉林职业师范学院电子系等。这里,既有主持图书馆学系的教授,也有多年从事教学工作的副教授、讲师,既有主管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局长、主持各大型图书馆工作的馆长,也有多年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且业有专长的图书馆专家。这么多领导、学者、专家能为《大全》的编撰而助我一臂之力,他们这种不计较虚名、惟求实用,不惶拔高、惟求普及的崇高精神,难道不是值得图书馆界传为美谈的事吗?而对于忝列所谓主编位置的我,尽管在《大全》编撰过程中于其中之“搭架”、“纽带”、“统稿”、“奔忙”的职责未敢稍有怠慢,但总的来说,对我却真正是一个学习和补课的过程。图书馆学科体系博而又多,所涉面广,《大全》编著者诸君各有专长,彼此之间,或学术商讨,激励切磋,或抚躬讨教,互相启迪,对我添补荒疏的学业裨益甚大,特别是一些师长那种有渊博学识却又一丝不苟地追求深入浅出的风格,更为我树立了治学的榜样,使我感铭不忘。

这里，还应当向《大全》的广大读者作一解释，并表示最大歉意的是，《大全》于1980年开始以油印本用于教学，从1981年开始铅印出版，仅仅十五种书，何以拖延六、七年之久，至今才出齐呢？

责任仍在于我。一是从第一本书编辑出版之始，即定下了一条原则：每种著述，要简而明、少而精，为做到深入浅出，提倡多次易稿，不达到标准，决不轻易付梓。以《大全》之十二《目录学》为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朱天俊老师原来慨然答应为我们撰写这本通俗的目录学教材，后来，他因教学、科研和系里的工作繁忙，不得拨冗，便来函辞退此事。《大全》编委会的同志遂推荐我的一本目录学书稿作为《大全》之十二出版。此书稿是1980年9月至1981年2月间，我被聘为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兼职教师时形成的。我为该系79级42名同学讲授目录学课程，反映尚可，经由李甲芹、董惠敏、张海齐、暴国霞、张永伟等同学根据我讲课的录音带整理成稿，由我又据讲稿重新斟酌去取而成书，得一27万字的《目录学教程》。当我将此书稿拿去征求意见时，多数同志认为可用，唯赫彦生同志则力劝我不急于出此书，理由是：此书固然基础颇好，不乏某些个人治学时的独到体会，但总体来讲体例不严密，章节之间照应不够，作为中专教材难免使学生迷惘而不得要领。诤友之言，切中我心，我不能以矜奇炫博、横生枝蔓的半成品付梓而去贪图虚名，故将此书稿束之高阁。这就使《大全》的出版发生了延期问题。

1984年夏，我邀请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倪波、白求恩医

科大学图书情报系宋运郊、《大全》副主编曹殿举三位同志根据我重新拟定的《目录学》新纲目二次撰稿，共分八章，每人二章。当大家将任务完成、送我统稿时，遇到了难处。我们四人的手笔各有千秋，如单独成篇，均不乏真知灼见，但如综理成一书，我却难膺此重任，因书成众手，论点歧异，内容重复，文风亦不一致，我虽试着调整篇章、斟酌文字，终因水平所限而作罢，而更主要的是，这一书稿深入有余，浅出不足，适合大学生、研究生而不适合中专生。好在彼此都是多年相知的学友、同行，我诚恳的道歉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谅解。这就使《目录学》书稿一拖再拖，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孟昭晋同志全力相助，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目录学简编》一书。而这已经是1987年的春天了。

《大全》出版之所以拖期，还因为其中品种内容上的调整。当我于1980年初草就《大全》总纲目时，第一种书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1980年5月，学校的第一本教材即是我和董明刚同志合著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油印本）教材。后来，学员们反映，他们希望了解一些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知识；图书馆界的同行们也认为，作为中专函授教学，开宗明义第一步，不应该将学员引到“史”的领域，而应从“论”入手。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就舍弃了《事业史》的选题而重新拟定《图书馆学》一书的纲目。1983年9月到1984年2月，我应聘到长春师范学院为其图书馆学专业两个班讲《图书馆学引论》，就依此纲目写了十余万字的讲稿，并以此为基础，修改一过，去征求意见，得到的反映与《目录学教程》相似，于是我毅然地同意了少数同志的后一种意见，取消了将我这一书稿列为《大全》之

一出版的想法。从1985年到1986年间,我根据我对图书馆学理论问题的思考,拟出新纲目,并主动地邀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孟广均、辛希孟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况能富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梁林德同志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杨沛超同志分章撰文,承他们大力支持,各人就自己所长,写出了相应的章节,终于成书,是为这套《大全》之一《图书馆学引论》。而时间也已经到了1987年春天了。

以上是对《大全》在这七年内编辑过程和出版拖期原因所做的交代。原计划《大全》出十种,八十万字,现出十五种,一百五十万字;其中有两种——《图书馆学论文索引》和《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主题索引》属于工具书,只是《大全》的辅助性学习参考书;作为《大全》主体内容部分者只有十三种书,一百三十万字。比原计划超出了品种、字数,反映出七年间我们对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知识内容必须不断增添问题的思考,《大全》在一定意义上清晰地划出了我们对相对地固定本专业教材内容进行探索中所留下的足迹,她是学习和总结的纪录,也是岁月的航标。

我永不为自己写的那三本有关图书馆学、图书馆史、目录学小册子未作为《大全》出版而反悔,而确感到这是一种幸运,一种因我之“自裁”而有更好一点的著作去代替她们的幸运。忆昔这七年内,当我刚刚画出《大全》粗线条的轮廓、使之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之时,深感图书馆学界所需的参考教材、专著寥寥,几不敷用,当我接受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学院聘请去讲授目录学、图书馆学基础课之时,深为自己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薄弱、零散而内疚;今天随着这两门课程

备课和教学，结合《大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的辛勤耕耘，我总算在对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其宏观方面与微观方面，其分析与综合方面，其狭而深、宽而广的专题的理解方面，有了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图书馆学的建设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来搞，而不是一个人能包得下来的，所以不妨各就己之所长来发挥；我的那三本小册子仍束之高阁，如有可能自当重新加工，使之间世，但那也只有待于来日，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虽然己书未成，殊增愧赧，但自认对于《大全》的出版，终究坚持了“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标准，于心还是聊以自慰的。

三、结构内容

近十年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图书馆界也在反思、探索、拓展中开创了活跃、开放、进取的繁荣局面。图书馆学研究的开拓、创造意识不断增强，因循保守的风气不断改变，目前我们面临着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科学体系的艰巨任务。《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正是在这一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之，她的体系、结构和内容，也不能不烙印着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建设自身学科的观点，溶进了全体编著者对我们学科体系、结构和内容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究竟应该开设哪些课程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必备课程？这始终是《大全》编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教材，《大全》是供欲达到中专水平的读者、自学者使用的，她的知识覆盖面与掘进层，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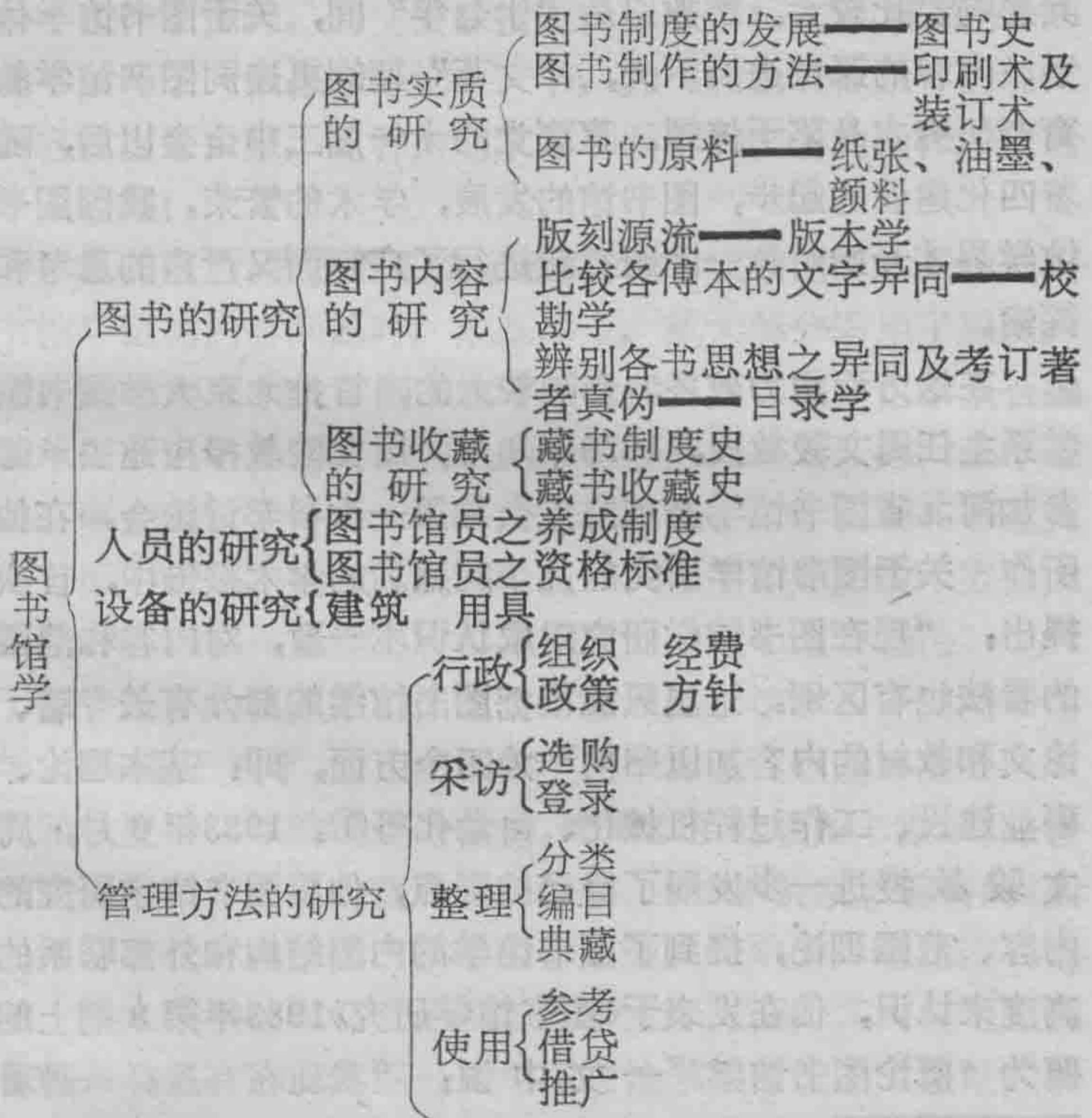
的结构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反映着我国当代图书馆学结构观、内容观的一个侧面，甚或可以说，她是当前图书馆学所涉足的主要领域的一个缩影。

在我为《大全》拟定框架、起草各书纲目的初期，以及在《大全》编辑、出版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结构、补充内容时，始终本着立足当代我国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的实践，统摄古今中外图书馆学及其相关学科主要理论的指导思想，尽量将至今为止在本专业学科领域可以立得住、并能够指导工作实践的基本观点、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与技术，能够向学员和读者做一通俗的介绍和阐述。

据我所知，人们已经并且正在对图书馆学科体系、结构和内容做出过许多极为有益的探讨。

早在1911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曾任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校长的普拉莫提出图书馆学基本知识内容大体包括管理、技术、目录学及批判（即书刊选择与评价）等四个方面，并围绕这四个方面各开出了五、六门课程。1931年，德国图书馆学家柯其纳将图书馆学区分为历史哲学的研究和管理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两大体系，又在历史哲学的研究中下分图书及其历史、书史两部分，且各开设一些有关课程；管理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中下分组织与业务、技术问题两部分，且各开设一些有关课程。1935年，我国图书馆学家李景新大体上接受了柯其纳的观点，并将图书馆学的体系内容加以充实，划分为历史的和系统的两大范畴，前者包括图书学，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历史研究；后者包括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际，下以所谓行政论、经营论、形式论为纲，分别列出具体类目

达41个之多。之后，刘国钧教授将图书馆学分为图书、人员、设备、管理方法等几个要素，每要素下均设立分支，涉及十多个领域。我国台湾省图书馆学者王振鹤先生曾参酌刘国钧教授的观点，将这一体系列表说明如下，并认为这一体系是“偏重于实际的观点”①：



注①王振鹤著：《图书馆学论丛》，第21页，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

我国除李、刘两家关于图书馆学体系的观点外，还有1922年杨昭愬所列图书馆学结构表和1936年俞爽迷所列之表，这两表未超过李、刘两家的水平，在此不赘。总的来讲，我认为，刘国钧教授的观点应被视为我国解放前关于图书馆学体系、内容的代表性的观点，对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实践，其影响也比较大。解放以后“十七年”间，关于图书馆学体系、内容的探讨进展不大，“文革”期间更连同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本身陷于停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四化建设的起步，图书馆的发展，学术的繁荣，我国图书馆学界才开始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广泛而又严肃的思考和探索。

在这方面用力较多、影响较大的，首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周文骏教授。1979年8月，周文骏教授应邀去承德参加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在他所作《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首次提出：“现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不一致，对内容和范围的看法也有区别。这里只能根据图书馆学的部分有关专著、论文和教材的内容加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基本理论、事业建设、工作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等^①。1983年6月，周文骏教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将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范围理论，提到了图书馆学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的高度来认识，他在发表于《图书馆学研究》1983年第3期上的题为《概论图书馆学》一文中说：“我现在有这样一种看

注① 河北省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论文选编》，1980年3月。

法：图书馆学是由一组学科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可以称之为图书馆科学，它的结构可以用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三部分来表述”。同时他对与图书馆学有外部联系的相关科学、与图书馆学结合而产生新课题的科学，或图书馆学只是利用了其中个别理论与技术方法的那些科学也作了探讨。周文骏教授还为《大全》这套普及性的丛书撰写了《情报学导论》一书，为《大全》体系中的现代内容做出了贡献，这种为追求真理而不求虚名的精神，也确令人钦佩！

自此以后，我国图书馆学教材、专著或理论文章在论及图书馆学结构内容问题时，或基本上，或大部分采用了周说。如：198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中关于图书馆学的内容划分为：基本理论、事业建设、业务工作的内容和方法、科学管理和事业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与周文骏教授1979年所归纳的四个方面大体吻合；1985年吴慰慈、邵巍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中关于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描述为：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四个方面，也基本上是以周文骏教授1983年的观点为依据，唯增添了比较图书馆学，并将理论图书馆学更名为普通图书馆学。1985年黄宗忠编著的《图书馆学导论》中将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归纳为：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三个方面，其内容与周说也基本类似；1986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中认为图书馆学结构由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两大部分构成，也沿袭了周说，唯将周说中专门图书馆学